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敬奉薄酬。
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習近平強調堅持和完善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郝鐵川就十八大報告答市民問

12月24日全天和25日上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分別走訪了各民主黨派中央和全國工商聯，共商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大計。習近平表示，長期以來，各民主黨派作為中國共產黨久經考驗的親密友黨和社會主義參政黨，始終同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緊密合作、團結奮鬥，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做出了不懈努力。中共中央將堅定不移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堅定不移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加強同民主黨派合作共事，支持民主黨派更好履行參政議政、民主監督職能。

■2012年12月25日，習近平等中央領導走訪各民主黨派中央和全國工商聯並座談。　新華社

共產黨領導 多黨派合作

有些香港市民對內地實行的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不是很清楚，以為內地只有中國共產黨一個政黨，不知道除了中共以外，還有八個政黨（即：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等，習慣稱他們為民主黨派）和一個中國工商界組成的人民團體和民間商會——全國工商聯。中國內地政黨制度的顯著特徵是：第一，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各民主黨派不是在野黨和反對黨，而是同共產黨合作的友黨和參政黨；第二，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在國家重要問題上進行民主協商、科學決策，集中力量辦大事；第三，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互相監督，促進共產黨領導的改善和參政黨建設的加強。這一政黨制度既避免了多黨競爭、相互傾軋造成的政治動盪，又避免了一黨專制、缺少監督導致的種種弊端。中國內地政黨制度的優勢就在這裡，同國外一黨制和多黨制的根本區別也在這裡。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是在中共執政以前歷史地形成的。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為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而共同奮鬥；團結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如何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問題。從5月5日起，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致公黨、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人民救國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等相繼發表聲明、宣言和通電，響應中共的「五一」號召。1948年8月起，各民主黨派、各民主階層的代表人士陸續進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與中共共同進行新政協的籌備工作，逐步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

完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

這一政黨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被中國憲法所規定的基本政治制度。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加強同民主黨派的政治協商。把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堅持協商於決策之前和決策之中，增強民主協商實效性。深入進行專題協商、對口協商、界別協商、提案辦理協商。」預示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的程序化、規範化、制度化建設將會進一步增強。

條條大道通羅馬，各處鄉村各處例。各個國家的政黨制度都因歷史傳統、現實需要的不同而不盡相同。中國內地的政黨制度是歷史形成的；它吸收了現代西方政黨制度相互監督的優點，也避免了他們相互傾軋的缺點；具有保持政策穩定連續性、避免國家分裂動盪、集中力量辦大事、加速實現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現實優勢。

亂設街站不顧市民安危

美恩

有亂港傳媒近日報道：「民陣近日疑再遭警方陰招打壓，表明會在元旦遊行當日嚴厲執法，禁止逾50個參與遊行團體在沿途馬路擺設街站。民陣批評警方安排嚴重縮窄民間團體表達和籌款空間，擔心先例一開，警方會用相同手法打壓七一遊行。有團體直斥警方做法旨在遏制各團體及遊行人士倒梁聲音。」

看見這樣的分析，便知道反對派的反智程度已經去到無可救藥的地步，他們顛倒黑白，侮辱市民智慧。事實上，真正阻礙遊行進行的並不是警方，而是分佈如水銀瀉地般的所謂街站，遊行原先是通行無阻的，但因為亂設街站，市民才會被「停一停，擋一擋」，若果將這些「路障」取消，遊行豈不可以進行得更加暢順？

任誰都知道，反對派所謂街站，表達意見是假的，向市民籌款才是真的，他們「掛羊頭，賣狗肉」，表演七情上面，「決心」推動「民主」，無非想榨盡遊行人士之一分一毫，惟這樣一邊讓市民遊行，一邊讓團體籌款，當中存在難以估計的危險性，因為遊行人數有幾多，警方不知道，遊行人士是否有過激行為，警方亦不知道，若有人在遊行中發難，出現失控情況，那些「阻人前進」的街站極可能會成為市民的「催命符」。

早年蘭桂坊曾發生人踏人慘劇，就是因為前排的人被推倒，後面的人失控紛紛踏上所致，由此可知，警方今次訂立多點限制，並非如反對派般說「嚴重縮窄民間團體表達和籌款空間」，而是以遊行人士的安全為第一考量。

若警方刻意遏制各團體及遊行人士聲音，他們便不會批准遊行；若警方故意令反對團體「斷水斷糧」，他們大可連牌照也不用簽發，以及取締他們所有籌款活動。市民須知道，若反對派團體有合適牌照，他們在遊行以外地方申請籌款活動，警方通常是不會阻止的，警方今次的特別安排，是汲取過往的經驗作出取捨，目的是減少失控的可能性。

■以往元旦大遊行均造成混亂，警方限制街站有實際安全考慮。

依照過往遊行推算，遊行人數愈多，團體所籌得的款項愈大，反對派人士之所以大力鼓吹遊行，無非是想從遊行中「抽水」，如今警方加以阻止，他們當然要指鹿為馬，抹黑警方，惟他們的出發點自私自利，置遊行人士之安危於不顧，市民要認清楚他們的真面目。

反對派倒梁禍港

季霆剛　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

反對派近日氣焰囂張，將倒梁戰線由立法會延至街頭。反對派策動的所謂倒梁「三部曲」，是濫用立法會權力打擊特首威信。雖然明知不可能通過，卻花費了大量人力物力、浪費光陰，實愧對市民。市民希望立法會議員奮力為香港經濟民生建設出力。然而，反對派卻是以政治為先、社稷次之。在長者生活津貼一役拉布阻撓；對平穩樓市措施毫無良策；對新界東北發展全盤推翻。為阻止終審法院向人大提請釋法，全面解決「雙非」問題，竟不惜對終院說三道四，損害司法獨立。

梁振英儘管在處理僭建上有不慎，但已善後認錯，罪不致死。反對派對梁振英的指責大多是穿鑿附會，要彈劾特首更是缺乏理據。身為立法會議員是否應有根有據，才請出「尚方寶劍」呢？反對派無理彈劾，明顯是別有用心，只會不斷損害立法會的公信力。

早前梁振英上京述職，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的講話傳達出三個重要信息：一是肯定和繼續堅定支持梁振英及新一屆特區政府的工作；二是強調中央對香港的大政方針不會變；三是對具有強烈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廣大香港同胞表達高度信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表示，中央支持特首依法施政，香港特區一定會改善民生、發展經濟。國家黨政領導明白到香港需解決民生所需，提升人民生活質素，並且會以國家的巨大支持作後盾讓香港提升競爭力，勇往直前。但反對派不思民生、原地踏步，甚至變本加厲，實愧對市民所望所想，政府和政團應務實解決當下問題，施政惠民，團結精誠方為香港之福。

美「重返亞太」勢將強化干預香港事務

思成

中共十七大報告涉港澳部分內容中提到「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預香港、澳門事務」，十八大報告指出要「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顯示中央警惕外部勢力特別是美國干預港澳事務，以及在香港普選過渡期中央相應地要加強權力的緊迫感。對這一提法的變動不要局限在僅從港澳本身政治、經濟和社會形勢上來解讀，也不應只從通常意義上的美國干預手段上去找佐證，要將其置於美國着急「重返亞太」並引發新一輪中美博弈的背景下去審視。

美在港的有形和無形力量

美國在香港形成了一支有形的力量隊伍：一是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二是在港金融機構和跨國集團。美國公司差不多在香港所有金融或商業領域都十分活躍，可以用「工作關係」的幌子見想見的人，辦想辦的事。用楊甦棣的話來說，美國總領事館致力於與本地私營機構合作，確保美國公司能獲公平競爭及投資機會。而在這一過程中，美國金融、經濟霸權對香港的影響力增大是不言而喻的。一個例子是，美國2012年相繼推出QE3、QE4量寬措施應對復甦不力，因為港元與美元掛鈎，美元流動性氾濫，香港金管局在兩個月內，共計27次承接美元沽港元，總計向市場注資2,500億港元，密度之頻相當罕見。

三是熱衷報道和評論港澳事務的西方傳媒機構運作日益成熟。反對派傳媒掌握本地話語權，西方新聞機構特別是在港媒體跟着響應，互為發聲平台，集體製造國際輿論，為中央政府以及特區政府施政製造外圍壓力。客觀報道特區政府施政和運作的輿論處於弱勢，親中媒體繼續被動。不要說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經常被當作「靶子」打或是被「吃豆腐」，連帶中共及其領導人也會被本地和西方媒體抹黑和攻擊。在香港回歸後的歷次重大事件中，美國及西方與香港一些傳媒在主導政情輿論走向中，發揮了重大影響，矛頭直指特區和中央政府，使香港政情輿論呈現「一邊倒」態勢，對香港的政治生態及輿論生態的負面影響怎麼說都不過。

美國在港還有一支無形的力量可資利用。除了年度的「六四」活動和七一遊行，近年來香港的政治主戰場已經由立法會逐步擴展至街頭和網絡，「公民社會」在香港被狹義地曲解為只是公民抗爭，形成一支對抗政府的力量，這也是美國樂見、讚賞的新局面。中央理解港人在回歸前長期受西方價值觀影響並較為認同西方的那一套，但中央也想讓港人知曉並理解問題的另一面。在北京看來，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顯在還是潛在，美國在港澳政治事務上體現出的政治能量都是負面、消極的，都是不受歡迎的。比如2003年以來，中方多次警告和批評美國駐港總領事不要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有一種態度並認為，美方可以以私下方式向中方就有關問題提出關注及意見，但要避免公開提出，以免給香港傳遞錯誤信息。

警告起到了作用。近年來，美國政府或官方機構人士就涉港重大議題發表言論、公開干預香港事務明顯轉趨低調，而這似乎也與通常所言西方加大干預港澳事務力度有所出入，其實美國這樣做是有其道理的，因為香港反對派搞事能量大，雖然背後有美英的「影子」，但主要還不是他們資助反對派多少錢以及如何出謀劃策，而是兩方在反共抗中上意識形態的高度一致性所致。因此，不要小看香港反對派作為「代理人」的角色。香港有這樣的反對派、有這樣的輿論環境、有這樣的政治生態，美國還有在香港搞政治小動作的迫切需要嗎？美國在有關的涉港報告中多次指出，在法制、新聞自由和追求民主等方面繼續發出自己強大的聲音，對於香港來說非常重要；美國已經注意到港人多次表達對民主發展的期望，應由香港人和特區政府決定政制改革步伐；鼓勵香港各界領袖為爭取民主進程付出努力等。這顯示美國對港戰略的重大意圖：直接和港人對話，並藉此發揮影響力。

香港的反對勢力應當清楚，無論他們承認與否、願意與否，事實上他們就是美國和西方反華勢力的「工具」，這完全符合美國重返亞太這一借力打力的路徑。美國「重返亞太」就是要強化在該地區的力量存在，自然也包括要強化在香港的力量存在，並且按上述模式「整合和工具化」香港的反對勢力。美國之於香港要達到的是戰略牽制和長遠影響中國的目的，如果代理人、馬前卒投懷送抱，能幫其達到這個目的，本身就已經屬於「干預港澳事務的外部勢力」。正是從這點上講，伴隨着其重返亞太的步伐，美國將借力借勢、與香港本土反對勢力結合進而達到強化其干預港澳事務力度的目的，這一形勢既不依中國意志為轉移，又為中國「防範和遏制」這一結合帶來複雜局面和很大難度。

香港被推到「反中」的風口浪尖上

十八大報告所反映的中央對港政策和治港方向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加強中央的權力；二是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眾所周知，香港民情民意的扭轉是削弱、排除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的根本保證，這將是一個長期的、漸進的過程。

2012年12月10日，美國情報委員會發佈題為《全球趨勢2030：可能的世界》（Global Trends 2030：Alternative Worlds）的報告，指出中國將在2030年前幾年超過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並足以成為最大的「規則改變者」。報告同時指出，中國崛起同樣存在「不確定性」，如果東亞領海爭端升級，亞洲國家勢必站到美國一邊，中國將成為美國「最大的敵人」。 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科吉姆強調該報告並非要預測未來，而是旨在為新當選總統及其政府提供對未來15至20年內的全球戰略評估的框架。通過對美國甚至各國決策者的影響，來塑造有利於美國、符合美國利益與價值觀的未來世界秩序。在報告的每一部分，「中國」都頻繁出現，「中國」成為一個關鍵的主題。這份報告實際為美國重返亞太提供了合理化證明並指明了方向，因應中美力量對比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美國要為中國可能成為其「最大的敵人」做準備，而將香港視為其重返亞洲、制約中國的一個戰略支點也就順理成章。未來兩國無論怎樣管控分歧，只要中美還存有結構性矛盾，香港勢必要被外力推到「反中」的風口浪尖上。

（本文轉載自《紫荊》雜誌。）

飲東江水思其源

朱家健　清華大學中國法律研究生

眾所周知，香港彈丸之地，倘若只靠本港各水庫蓄水，根本難以應付七百萬人每天飲用、食用、清潔、各行各業等需求，東江為香港供水半世紀，香港人每天飲用的食水源自東江，我們喝東江水成長是不爭事實。說實在，東江水源是比選址增建水塘、化淡淨化海水及循環再用污水更可取。

日前，江西省人大副主任胡振鵬訪港主持「2012第四屆生態東江源(香港)論壇」，與出席人士討論發展環保、清潔能源、水資源開發利用、文化旅遊、綠色產業等領域。於2004年，江西省科技廳曾牽頭對東江源頭作出了科考調查，從水量及各類資料顯示，東江有兩個源頭，分別為東源，尋烏的桠髻鈀山；以及西源，九曲定南縣，也將源自鵝公山和巋美山的定南水標榜為源頭水。兩源覆蓋尋烏、安遠、定南三縣。多年來，東江源區三縣致力守護水源免被污染，為了維護東江源生態，不惜犧牲發展礦區，以及限制工業和婉拒污染耗能的行業，每年減收數以億元，居民在縣內因欠工作崗位而普遍往外尋求發展機會。筆者不禁感嘆「潔淨水源得來不易，護源有代價」！

對於保障東江水源的質量可達飲用保證，江西省政府更積極以政令對源頭加以保護，於2003年8月1日，由江西省人大常務委員會通過「關於加強東江源區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的決定」；於2009年4月，由江西省政府發出《加強「五河一湖」和東江源頭環境保護的若干意見》和《關於設立「五河一湖」和東江源頭保護區的通知》；於2011年，由江西省政府發出《關於將定南縣部分區域增列為東江源頭保護區範圍的通知》，明確了東江源頭保護區的範圍，劃定東江源的面積達816.07平方公里；而國務院更於2012年6月出台《關於支持贛南等原中央蘇區振興發展的若干意見》。東江源保護隨即被正式納入國務院規劃，成為國家生態補償試點。

尋烏、安遠、定南的源頭三縣因生態保護而未能全面發展而蒙受經濟損失，中央財政、廣東省和江西省共同設立水環境補償基金，用作東江源生態補償，自2010年起，江西東江源成為中國三個生態補償區之一，為當地致力保存水源免被污染的貢獻作出補償。

江西、廣東兩省也就東江水源作出考核標準以保障對下游供給東莞市各區、深圳市及香港的水源得到可靠的食用水。「水從哪裡來？」很多朋友都會給予從水龍頭或水庫的答案，從了解了東江水源頭三縣作出的經濟犧牲，望香港讀者更珍惜得來不易的食用水，亦對祖國和東江水來源背景有感恩之心，飲水要思源，做人勿忘本。